



崔继丹◎著

闯荡澳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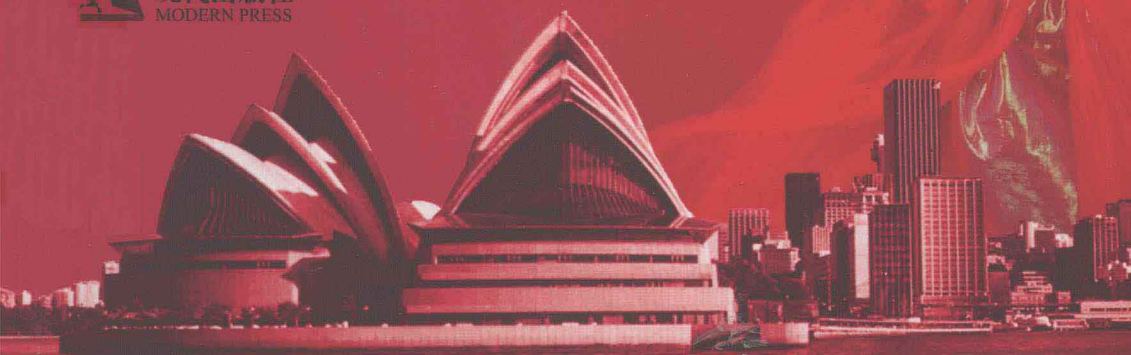
在与她分享这段海外的特别历程之前，
请稍作停顿，再次环视所处的世界。

因为在读过这本书以后，
你眼中的出国之路，将会永远不同。

Exploring Australia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崔继丹◎著

闯荡澳洲

Exploring
Australia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闯荡澳洲 / 崔继丹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244-805-6

I. ①闯… II. ①崔… III. ①留学生—学生生活—
澳大利亚—文集 IV. ①G639.6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8444号

闯荡澳洲

- 总 策 划 吴江江
作 者 崔继丹
责任编辑 张 璐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64267325
传 真 (010) 64245264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805-6
定 价 29.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我为你骄傲

(代序)

崔凯

亲爱的女儿：

那一年，在西方过圣诞节的日子，你在中国出生了。

在产房门外的我，听到了你的第一声啼哭，并没有觉得惊天动地，也没有分辨出什么特殊的旋律。让我和你妈高兴的是，你很正常。

接下来就是我们忙忙碌碌、毛毛糙糙地哺育你，盼着你快点长大。虽然，既无育儿经验又缺经费和精力，拉扯一个吃奶孩子（吃牛奶）很辛苦。可是，因为你的到来，给咱这个小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记得你从小很好吃、喜美食。可咱家那时经常发生“金融危机”，基本属于“月光族”，老爸隔三岔五就到菜市场去寻找扒堆儿菜。有一次，你（大约三岁）提出要吃饺子，我们满足了





你的要求。当三鲜馅饺子端上桌子，你兴奋异常，可能是为了表示高兴，拿起一个碟子摔到地上。你妈说：“你再摔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又摔一个碟子，那时咱家的碟子还没多到可以随便摔的程度。你妈生气了，教训你：“好你个小东西，这么丁点儿就敢摔碟子，摔一个不过瘾还摔两个，你是不找挨打呀？”你却一脸无辜地说：“是你让我再摔一个！”我在一旁击节喝彩：“摔得好！这孩子真听话。”后来，咱家换了塑料碟子，你就再没摔过。

还记得，你从小就很务实。有一次，你妈下楼去洗菜（那时咱家住的是早楼），把你放到藤椅上，你不小心摔到地上。我回家后，你让我看头上的包，我问你哭了没有？你说：“没哭，我妈没在屋，哭也没用。”这种儿童实用主义让我很长见识，原来哭也需要有听众啊！

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没有像别的父母那样对你精心呵护，基本属于粗放散养。那时，你妈在报社，我在文化局，都是单位的小头目，经常不能按时下班。因此，你不得不到处混饭吃，楼上楼下，张王李赵，一概通吃。不仅吃，回家还要发表评论，谁家饭凉、谁家菜淡，哪家屋冷、哪家灯暗，你都能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也许，你善于观察生活的习惯和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你的少年时期也很特别，我们没有时间带你去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的星期天和节假日大部分是跟你妈在《法制与文明》杂志社度过的。跟着叔叔、阿姨分杂志、打包装、贴信签，什么活都干。别人叫你“小总编”，其实，你就是他们的义务童工。后来，你上大学时，还真给自己封了个“总编”的头衔，组织同学办了一张报，从组稿、画版、到印刷发行，样样在行。报纸出来后，你受到了校领导的大力表扬。出国留学到澳洲，你又牵头创办了一份《学声报》，得到了中国领事馆的赞扬和支持。我为“崔总编”的成就感到高兴，你妈则自鸣得意地说：“看看！要不是从小总跟我去杂志社，她能会办报吗！”这份荣誉当然可以归功于她。

你的写作能力肯定是受到了我的影响，虽然，不是“老鼠生儿会打洞”，但毕



竟你从小就看着我写剧本、搞创作。有一次，看到我发表过的半皮箱作品，你还不忿地说：“将来我要超过你！”在这种原作用力的促使下，你也试着写过《白猫警长》之类的失败之作。在小学4年级时，由语文老师推荐，你在《新少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题目叫《鸭嘴鸟》，内容是写我送给你两只小鸭子，却骗你说那是两只珍贵的“鸭嘴鸟”，你信以为真，精心喂养，后来，终于发现“鸭嘴鸟”不过是两只普通的鸭崽子，于是，你再也不理它们了。文中表达了对我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反思了自己的轻信。我看了很开心，有道是，愤怒出诗人，你能够把自己上当受骗的真实感受写出来，已经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泛酸诗人好多了。

你在大学的四年没有虚度，因为喜欢文化传媒和播音主持，所以，你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临近毕业，有两家电视台主动提出要你，你从天津打电话给我，直截了当地问我：“如果我要继续念书你还供不供？”我也直截了当地回答：“当然供啊！”你又问：“我要是出国留学你供不供？”我说：“也供。”于是，你径直去了北京，找了一家最廉价的旅社住下，到“新东方”恶补英语；于是，当你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的同时，也收到国外三家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于是，你打点行囊准备出国；于是，老爸老妈像被掏空了心肝一样把你送上了飞机，眼泪巴巴地看着你远走高飞了。

送你走后，我写了小品《送水工》，赵本山把这个小品搬上了辽台春晚和央视春晚，感动了许多留学生和痴心父母。有很多朋友都说，看这个小品差点儿掉眼泪。我和你妈却不是差点儿，而是泪如泉涌。在你离家的头几个月里，我和你妈在家几乎不敢提你，可只要说话就是你，你从我们的开心果变成了催泪弹。特别是你那坚强果敢的老妈，身为二级警监，轻易绝不动容。这回例外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甚至不敢进你的房间，因为看见你的床、你的书、你的所有东西，她都要哭。不完全是因为想念，更多的是挂牵。尽管，你每次来电话都用最快乐的声音告诉我们：“我很好！非常好！”可是，凭着我们多次出国考察所掌握的情况，我们



清楚，一个只身闯荡澳洲的女孩，漂泊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你要面对多少挑战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非常好”只是你对我们的一种宽慰而已。

事实上，你踏上澳洲国土就遇上了一连串的困难。首先是寄宿家庭老太太的刁难，指责你给家里打电话太多；洗澡时间太长；饭前不应该吃水果等等。一气之下，你炒了老太太的鱿鱼，搬家另住。在学校，个别对中国文化有成见的教授在课堂上信口胡言，你很气愤，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挺身而出驳斥教授的错误观点。结果是那位教授恼羞成怒，给你们所有中国学生一个报复——考试不及格。你带领同学据理力争，不屈不挠地奋勇维权，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安排其他教授重新审阅你们的论文，还你们以公道。那位褊狭的教授辞职走人了。

在生活上，你精打细算、克勤克俭，把在国内可以享受的“小公主”待遇，主动降低到了澳洲的贫民水平，还利用课余时间打工赚钱。我一再告诉你，老爸奉行“穷养儿，富养女”的原则，咱家不差钱，你的学业太重，可以不去打工。你却说：“打工也是学习，不打工是不完整的留学生活。吃点苦没什么，权当是天将降大任于我，苦心志、劳筋骨，乐在其中。”

我们知道，当年摔碟子的小姑娘长大了，成熟了。出国留学不仅开阔了你的眼界，同时经过了风吹雨打和诸多磨难，使你实现了文化的觉醒、生命的觉醒和新闻精神的觉醒。你凭着过硬的专业功力和敢打敢拼的精神，自荐到了澳大利亚SBS国家电台，从实习到主播，从采编播到自创新栏目，你使出了浑身解数，大显身手。在工作实践中你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艺不压身”，正是由于你平素的文化积累和知识储存的相对丰厚，你才能在自创的“360行”、“女性茶座”、“情感讲述”等栏目中纵横捭阖，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西方现代文化融会贯通，巧妙链接，大大提高了你们节目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欣赏性。你以自己特有的主持风格和文化魅力吸引了庞大的听众群，在澳洲各地都有了你的粉丝。据说，还有老华侨专程从悉尼自费到墨尔本去看你。我的一位当台长的朋友到澳洲访问归来，打电话告诉我：

“你的女儿很优秀。”这一句话，让老爸的虚荣心得到了好几天的满足。

本来，在电台当主播就是一份累心累人的工作，可你又到州议会去应聘，给一位女议员当助手。议会是你不熟悉的领域，何况又面临大选，我说你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没想到你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凭着你的善良和爱心，努力为选区华人谋幸福、办好事，赢得了信任，打开了局面。在澳洲大选中，你主持了大型活动为陆克文拉赞助；在维州大选中，你发动华人选民支持女议员，组织志愿者大造声势，最终使女议员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当女议员热泪盈眶地向你表示感谢时，你却说：“我是你雇用的选区官，为你工作是我的责任，你最应该感谢的是本选区所有的华人选民，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你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卓越的组织活动能力令我赞叹！

你在澳洲学习、工作的五年，虽然仅仅是你人生中所迈出的一小步，可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这种特别行走，很好地检验了你的生存能力、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和交往能力。如果让我给你打分，这四门功课你都是优秀。首先说你的生存能力，这是让所有80后、90后的父母们最操心的事情，送孩子出国，他们能生活自理吗？你却不然，从小的“粗放散养”练就了你适应环境的能力，面对困难你从不抱怨、不退缩，敢于知难而上，善于以苦为乐，凡是日月所能照临的地方你就能找到快乐。加上你出国前自务了一手厨艺，不但能让自己吃饱吃好，还能照顾一下身边的同学；再说你的学习能力，你知道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什么，每一节课时都是咱们花钱买来的，不能拿自家的“银子”打水漂玩。加上你对语言的掌控能力和对国际文化传媒的喜好，比较轻松地戴上了“硕士帽”；面对工作，你常能让自己兴奋（甚至是亢奋）起来，我很欣赏你常说的一句话：“要么不干，要干就必须干好。”因此，你不放弃一切细节，能够把所有承担下来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交往能力本来就是你们学文化传媒的一项内容，加上你自修了大众心理学，所以，你在与各种肤色、各个阶层的人士打交道时都能做到应对自如。特别是你学会了用文



化眼光看世界，用东西方文化比较学去解读西方人的文化心理，这使你在采访和社会活动中事半功倍。

你在澳洲奋力打拼的这些日子，陆陆续续地发给我一些随笔和散文，我多次被你的文章所感动，如：《兄弟姐妹咱不哭》、《播音室日志》、《胜者王侯》等，都是从你心底流淌出来的激情和泪水。我鼓动你把这些零金散玉整理出来，集结出版。不为别的，或许让那些准备出国的孩子看了，会从你的奋斗经历中感受到一种力量；或许让那些正打算送子女出国的家长们看了，能够了解海外求学的真实境况，帮助孩子（包括自己）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或许让国内搞文化传媒的同行看了，会管中窥豹地了解一些西方传媒和受众的文化理念；或许让我们的官员和人民团体的有识之士看了，能够对西方议会和政治民主多一些感性认识；或许谁都不看，就留着到若干年后，你自己翻开看看，再感动自己一回。

在这本《闯荡澳洲》问世之际，你邀我作序。说实话，我曾为许多朋友出书作序，却从没有这次为自己女儿的书作序这样费心思。对于读者诸君，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本来这些文章是写给自家人看的东西，所以我能保证这些作品绝无虚构，事件真实、情感真实、文笔朴实无华，应该具有一定的阅读价值和可借鉴之处。我最想借此机会告诉我亲爱的女儿：人在世上走，刀在石上磨。成功不自在，自在难成功。你的奋斗、你的追求、你的成功，也许和当代成功青年相比较，不一定算佼佼者。但是，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永远是最灿烂的阳光，最鲜艳的花朵。我为你骄傲！

记住，在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里，你和你们这一茬人正逢其时，只要胸怀大义、正道直行、自强不息、努力进取，就会前途似锦，风光无限。

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老爸 2009年10月于沈阳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我为你骄傲 (代序) V

兄弟姐妹咱不哭 威廉教授.....001
大难临头.....004
破釜沉舟.....008
不打无准备之仗.....011
迟到的幸福.....016

播音室日志 适者生存竞技场.....024
对不起, 不同候.....034
三百六十行.....044
三百六十行/私人侦探048
三百六十行/耳朵052
三百六十行/饭店后厨帮工059
女性茶座.....064
女性茶座/留守女士069
女性茶座/浮世绘074

胜者王侯 前言.....080
瞎猫撞上老鼠精.....082
衣食父母.....086
得民心者得天下.....091
钉子户.....096
议员的人缘.....100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胜者王侯	磨刀霍霍·····	105
	一个好汉三个帮·····	110
	华人的力量·····	113
	获胜者——王侯·····	122
	尾声·····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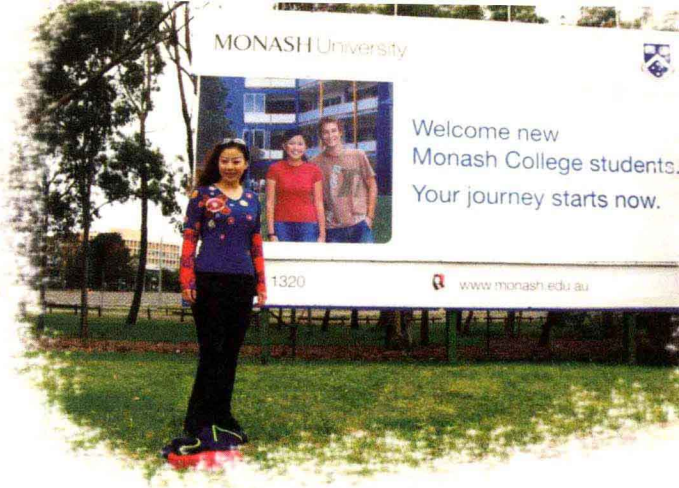
继丹所见	家庭寄宿（上）·····	134
	家庭寄宿（下）·····	136
	我的深沉·····	140
	黑姐，你不是公主·····	145
	斗法无赖“圣母”·····	150
	化蝶·····	154
	骂人的传媒·····	163
	流浪狗·····	169
	嘴大吃八方·····	173
	玉米飞过头顶·····	184

继丹所感	玩幽默的华人市长·····	189
	粉色的大猴·····	193
	管窥海外公费医疗·····	197
	走马观花 目中有啥·····	203

后记	一生一起走·····	211
----	------------	-----

兄弟姐妹咱不哭

威廉教授



◎ 刚到澳洲的时候，妈妈让我在大学“校门”前拍一张照片。外国的大学，没墙、没栏杆、没门，在大学的广告牌前，权当是有一个交代吧！

墨尔本炙热的下午，我直勾勾地盯着漆黑的电脑屏幕，头脑里浑沌一片。心情，像是一团被烧红了的铁丝网，烦乱、灼人、交错。

手机铃声大作，屏幕上显示出女同学A的名字。接起电话，她在里边带着哭腔说“Tracy，我想自杀”，接着传来低低的抽泣声。

这是今天下午第二个了。

我没想过死，却已近崩溃，硕士班里九个中国学生，全都被威廉先生逼上了绝路。

威廉先生是我们硕士课程第二年的必修课教授，主授“传媒与新闻道德”这一科。据说，他以前是一家知名大报的资深记者，因为妻子生第三胎，才屈尊来大学里教书，为的是腾出时间照顾新生儿。

威廉先生中等身材，略有发福，每次上课都穿着衬衫、西裤，嘴里喷着浓浓的咖啡气，灰蓝色的眼睛总射出闪烁不定的目光，紧紧抿着的薄嘴唇更是不轻易吐露心声。

上第一节讨论课，威廉先生就抛出了一个问题：“谁能说说中国和北朝鲜在新闻报道上的共同点？”外国同学纷纷把目光集中过来。

中国留学生面面相觑——在西方国家的字典里，“北朝鲜”几乎是所有负面新闻的代名词，而威廉把中国与“北朝鲜”放在一起比较，还要找出“共同点”，他是什么意思？

见我们沉默不语，威廉先生说话了，他说，自己经常研究英文版的《毛主席文选》，还在1996年去过中国，他觉得自己对中国还是蛮了解的。

这话听上去亲切，却不是善意。

在威廉先生的课上，中国的名字经常与索马里、古巴、前苏联同时出现；在威廉先生嘴里，中国是“红色的中国”。每当我们试图争辩，我们就成了“没有独立意识”、

“被洗脑”的“不称职的传媒人”。可是在我们来看，威廉先生才是被洗脑的一个。

然而，多说无益，争来辩去，就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我们明白，在海外学传媒，免不了发生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本着从学术角度出发的原则，我们尽量避免将问题复杂化。

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意识到：刀已架上了喉。

传媒学院研究生课程没有考试，只写论文。每学期有三个大论文，按照2:3:5的比例算入学期成绩。论文的分是我们的命根子——昂贵的学费、父母的眼泪、打工的汗水，目的只有一个——高分毕业拿文凭！

让我们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只要拿到文凭，就有了衣锦还乡的资本；没有文凭，就成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流寇。

写论文赚分，是我们生活的唯一重心。

用英语写论文难，而用英语写传媒研究生论文更是难上加难。我们不仅要把基本事实写清楚，更要提出有见地的观点——没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传媒学者，在西方学界是被人嘲笑和蔑视的。

为了能提炼出有价值的论点，我们每写一篇论文都要进行大量阅读，学科规定的基本标准是：三千字的论文，最少读三十本学术参考书，参考书数量要与论文字数同比例增长。

中国留学生都懂得笨鸟先飞的道理，每次写论文，大家都夜以继日地苦读，经常半夜三点还在网上激烈讨论。浓咖啡、棉睡袍、地上成堆的参考书，伴我们度过无数个疲惫的通宵。

天道酬勤，经过这样的努力和协作，几个中国留学生的成绩总是非常优秀。其他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笑话我们书呆子气浓，但是，我们苦在其中，却也乐在其中。

对于威廉先生布置的论文，我们也像以往一样，精打细磨地写完之后，便迫切地等待成绩发布。心底下，还暗自打着小算盘，希望能拿到最高分，夺个魁首。

万万没想到的是，梦想被现实完全颠覆。

第一个论文成绩发表了，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是59分——不及格。

这是一个尴尬的分数，也是文学院很少见的分数，水平太差，教授们会直接判个50分或55分，让学生死个明白；可上可下的水平，教授们便在评语上狠说几句，却让分数勉强过关。

传媒学院判分，主观意愿很强，没有固定的参考答案来做依据。得什么分数，全凭教授对论文的欣赏程度。

在威廉手中，所有中国研究生，都蹊跷地以一分之差不及格，我们决定去找威廉先生谈谈。

“有事吗？”见我们下课后都坐在座位上没走，威廉先生开口问道。

“关于论文，我们想与您谈谈，”我笑着解释。

“嗯，说吧。”威廉先生双手插兜，坐靠在讲台边上。

“我们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得了59分，不及格。”我试探着说。

“我知道，分数是我判的。”威廉先生的口气蛮不在乎。

“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原因吗，以便我们未来提高？”我陪着笑脸，表现出中国学生一如既往的谦虚——最起码是表象上的谦虚。

“这有什么可解释的，你们英文水平太低了。”威廉先生一言以蔽之。

“可是，我们都是通过了莫大国际留学生处的考试才读研的，”广州来的小静有点急。我在语言班时就认识她，她学习最刻苦，说她英语不好，在她看来是莫大的亵渎。

“而且，我们这几个人，”她用眼睛扫了一遍加以确认，“都是在上学期高分毕业的。”她说得没错，我们这九个中国留学生，上个学期的成绩很好，被其他专业的留学生称为“传媒九人组”。

“至于你们是怎么升学毕业的，我管不着。不过在我看来，你们现在的英语水平差劲透了。”威廉先生在尾音里甩出一丝隐约的轻蔑。

听他这样讲，我有点恐慌——或许是资深记者要求高，我暗地里想。

“威廉先生，”我开口问道：“照您看来，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提高英语水平吗？比如说参加补习，或是寻求校内辅导员的帮助？”上一学年的教授，就为我们单独开过辅导课。

“没什么办法，英语是一门精妙的语言，不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有提高！”威廉先生声音不大，说出的话却斩钉截铁。

“提高不了？”九人组里唯一的男生——盛楠，脑门儿出汗了。“那这么说，后面几门作业，就还有可能不及格！”

“恐怕是这样。”威廉先生耸耸肩。

“那我们就得交学费重读，还不能按时毕业！”盛楠属于很神经质的类型，仅仅在脑海里设想重读这件事，就已经让他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了——“学费那么多钱呢！”他喃喃自语道。

“这跟我有关系吗？”威廉先生似乎还有点幸灾乐祸。

“威廉先生，”我接着问：“如果说我们的英语水平低，就你看来在短期内也没有提高的可能性，您对我们有什么建议？”

“建议？”威廉先生冷笑了一声，“我对你们还能有什么建议？”他转过身去开始收拾讲台：“你们这些中国人啊，根本就没有一个配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读研究生。”

猛然听到这话，我们全倒吸了一口冷气。威廉先生恐怕也意识到话讲多了，拿起提包，连招呼都没打就冲出了教室。

呆坐了好几分钟，江西来的叶子才弱弱地说了一句：“你们说他是不是种族歧视啊？”

没人搭腔。

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现实。

兄弟姐妹咱不哭

大难临头

“他说中国人不配来读研究生是不是？这话他上学期也说过。”我们找到了一位曾经被威廉先生教过的师姐取经，她张口就说出了这句话。

“这个威廉先生专门跟中国人过不去，我们上一届一共有三个中国学生，补考了好几次才结业，好话都跟他说尽了，”操着北京口音的师姐快言快语，“他就是不喜欢中国人，你们现在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跟他摇尾乞怜，要么跟他讨个公正。”

说到这儿，她突然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当时没有条件跟他讨公正，只能讨好他——中国学生太少，没办法啊。可你们不一样，人多，九个呢！得，我还有事，先走了啊！”她大步流星地转身走了，留下我们在原地发呆。

原来这是一块硬骨头，一直有打压中国留学生的爱好，还频频得逞。这么看来，我们也不是他的对手。一想到这儿，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想退缩。

“可是他已经表示了，照这么下去，剩下的论文还会判我们不及格，”盛楠着急了：“咱们要是能想办法争取一下，也许还有希望，否则就只剩等死了！”

他看着大家问道：“你们真想花钱重读一学期吗？那可是一万多块钱啊！”

一提到钱，大家都沉默了。一万多块的学费是很大的数目，我们真无法向父母开口，有的是开了口，家里也拿不出。自己打工的话，是无论如何也赚不够这么多钱的。

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我们约定，各自去找权威人士重审论文，看看我们的论文写作水平是不是真的至于落第。

一周以后，我们拿着重审的论文碰头，结果是让人欢喜人让人忧。好消息是：我们的论文被各方重审教授肯定——从莫大国际处、研究生辅导员，到博士生助教、博士生导师，我们分头找的重审官都不约而同地为论文亮了绿灯。可同时让我们担心的是，既然论文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威廉先生故意为难我们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若是有意不让我们及格，做学生的恐怕回天无力。

“应该去找他的上司，”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地方——政教处。在国内上学时，总有政教处的教导主任来管理教学，海外大学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机构吧！在学校网站上一找，我们查到一个叫“研究生教学督导”的科室，就是它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九个人齐刷刷地站在了督导办公室门口。教学督导是个打扮精致的老太太，自我介绍说叫苏珊，她笑容可掬地把我们让进了办公室。

听我们说了对威廉教授的意见，她开门见山地向我们征询解决办法——“说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

听她这么一问，我们都有点发愣，还真没想过要提些什么要求。

见我们半天没回话，苏珊建议性地问：“你看你们是要要求改判，还是……”

她一句话点醒了我们，我们忙不迭地点头说：“对，对，我们要求改判上一篇论文。”

她笑了，说：“这好办，不就是改判吗！你们回头交给我一篇论文原稿，我按照程序找传媒学院作改判就是了。”

见我们个个忧心忡忡，苏珊又笑容灿烂地说：“大家不要有顾虑，这是一个经常发生的教学性纠纷。至于你们提到威廉先生有种族歧视情绪，我看大家是多虑了，不要把问题上升到这个高度，那可是个大罪名啊！年轻人，何必压力这么大，回头把论文打一份交给我，我就替大家解决了，今天大家都回去吧！”

出了督导办公室，我们如释重负，此时此刻，我们天真地以为，事情到此就有了完结。

这就是年轻人的幼稚之处。

第二天就是威廉先生的课，大家刚刚坐定，威廉先生便说：“我听说有些同学到督导办公室状告我了？”我们在下面紧张地互视一眼。

威廉先生冷笑一声：“依我看，这完全没有太大意义，你们因为自己的水平问题毕不了业，跟我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不能说因为你们的水平低，我就降低自己的专业标准。”

教室里鸦雀无声，其他国家的学生不知道威廉先生在说什么，而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却冷汗直冒。

威廉先生停顿了一下，接着讲：“既然我们在第一篇论文上意见不能统一，不如大家把精力放在第二篇论文上，今天我们就布置第二个论文题……”

我们于是开始更加努力地准备第二篇论文，昼夜奋战的同时，我们还在心里悄悄地盼望，系里能尽快发表上一篇论文改判的结果，为我们讨回公道。可是，直到第二篇论文成绩发表，送到系里改判的论文仍无消息。

当看到第二篇论文的成绩，我们都已经无暇顾及上一篇改判论文了——这第二篇论文，全班九个中国留学生全部都被判为58分——不及格。

在每一位中国学生的论文作业上，还多出了一段威廉先生亲笔写下的评语，在红色的墨迹下，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他写道：

“这篇论文是我看过最差的一篇文章，其粗劣程度前所未有，很难想象是出自研究生学生之手。按照标准，这篇文章根本不值一文，但是出于我内心的仁慈，勉强给你判为58分，以示安慰。”

——真是极尽讥讽之能事。

威廉先生走下讲台，一边发论文一边说：“这篇论文，我仍是按照专业学术标准来评判的，那些期望能得高分的个别人，恐怕要梦想落空了。”——毫无疑问，他说的是我们这九个中国人。

课后，我们仍旧留下，与威廉先生谈话。

“威廉先生，我们九个中国留学生，都得了58分。”我说。

威廉先生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好像很得意。

他当然有理由得意，我们的生死大权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是判分的教授。

作为学生，我们其实打心眼儿里想讨好老师。从小到大，谁愿意与老师唱反调？我们这些人飘洋过海地来求学，更是心情迫切地想顺利毕业。

“威廉先生，”我诚恳地说：“如果有任何方式能使我们的论文达到您的要求，我们都愿意加以尝试，并付出加倍的努力。”——这是我们的心里话。

威廉先生眉毛一扬，跷起二郎腿，嘴唇里轻轻地迸出三个字：“没办法。”

“那您看，以专业标准衡量，我们的论文有哪些不足？”我换了个角度。

“我说过了，你们英语太烂，有些语法错误是小学生会犯的！”威廉先生一脸的不屑。

“那我们论文中的观点呢？研究生课程主要强调观点性思维，论文中的观点您怎么看？”叶子忍不住问。

“观点我没看，”威廉先生脱口而出，他停顿一下，可能发觉说得不得当，又加上一句：“你们英语太差了，观点我没看懂。”

“威廉先生，大学在招国际留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留学生在用第二语言学习，”小静插话了，她读书一向最仔细，想必对招生简章也认真研究过，“我们存在的语言问题，在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论文中也一定都有体现，为什么每次只有中国学生集体不及格？”她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

“我们现在讨论你们中国人的问题呢，你别把别人扯进来！”威廉闭口不谈。

“我们知道，您是一位资深的记者和作家，在以专业标准要求我们。”我给他戴高帽，“可是，您为什么不让您的标准国际化一点呢？如果您以后有机会到中国去开国际传媒会议，与您打交道的可能就是这些人。而我们毕业以后，代表的